

筆談光復以來之軼事

妙哉！

「胡適」

對

「何容」

容」

●黃得時（國立台灣大學退休教授）

從臺灣語音到標準國音

我入小學之前，曾經在私塾用臺灣語音讀了兩年的漢文（日據時期，稱中文叫漢文）。讀的是「三字經」、「聲律啟蒙」一類的書。老師光教「念」，不加解釋。進入小學之後，又讀了四年間的漢文讀本（每週兩小時）。晚上在家裏，父親又教我讀唐詩和四書。這時已經有了解釋，對於中國古典文學漸感興趣。考入中學之後，又讀了五年間（每週仍為兩小時）的漢文。這時的漢文跟日本的國文聯在一起，叫「國漢」。教的是日本老師，以日本語音，用顛倒循環方法，教學生讀漢文。這種讀法，日語叫「訓讀法」。但是我卻不需要這一套，直接用臺灣語音，由上而下，依次讀下去，既方便又快捷，所以較日本學生懂得多，每次考試也都名列前茅。當時讀的教材都是中國文學史上不朽的名篇，諸如「陳情表」、「歸去來辭」、「出師表」、「春夜宴桃李園序」、「長恨歌」、「琵琶行」、「祭十二郎文」、「前後赤壁賦」、「正氣歌」等，在中國都算是家喻戶曉的作品。此外有詩詞之類。

中學畢業後，考入臺北高等學校，（介乎中學與大學之間，修業年限三年，畢業後始可入大學。現在之師大即為當時之校舍。）這時又讀了三年間的漢文，所讀的是四書和諸子百家選文，程度相當高。由於上述的關係，我對於中國文學早就發生很大的興趣。後來考入臺北帝國大學，就專攻中國文學。當時的指導教授是久保天隨先生和神田喜一郎先生。久保先生是日本有數的著名漢詩人，著作等身，研究「西廂記」，獲得文學博士。他講授「中國文學史」、「琵琶記」、「桃花扇」、「趙甌北詩話」。神田先生是書誌學（目錄學）權威學者，為日本京都學派開山祖師內藤湖南博士的高足，對於清代考證學有精深的研究。他講授「古詩源」、「日知錄」、「藝舟雙楫」（清包世臣撰）、「畫禪室隨筆」（明董其昌撰）以及「清代考證學之發達」等。戰後神田博士在日本刊行「中國文學在日本」（別名「日本填詞史話」）上下兩巨冊，極受學術界之重視，現為學士院會員。而我的畢業論文是「詞曲之研究」。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我從大學畢業，隨即進

入當時臺灣唯一的日刊報紙「臺灣新民報」社，主編中文和日文的副刊，並在該報以日文改寫「水滸傳」小說，前後連載五年之久。民國三十四年春季，太平洋戰爭進入末期，由於紙張缺乏，臺灣所有的報紙合併統一，創刊「臺灣新報」。不到半年，臺灣光復，「臺灣新報」由我方接管，發刊「臺灣新報」，而我繼續在該報服務，至三十六年四月底止，當過編輯主任，負責主編省市新聞。

如上所述，我因為在光復前已經讀了不少中國典籍，所以會寫為文章，也會用臺灣語音讀相當深奧的書。但是臺灣已經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了，我們不能永遠停留在這種地步，除了保留了臺灣語之讀音以外，還要用標準國音來讀書講話。這對於當時已經三十七歲，進入壯年的我，要從頭開始學習國音，實在是件很吃力的事情。但是我當時卻抱著「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堅毅決心，向這種困難挑戰。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絕好的福音傳來了，那便是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齊鐵恨先生，每天上午六點半，以及下午六點半，要在臺灣廣播電臺教國語，先由注音



誌 雜 外 中

① 作者黃得時教授偕夫人與公子黃建雄合影。

② 黃得時教授（前排右四）何容（前右六）趙廣颺（前右七）早
年出席國語日報董事會時留影。



符號開始，然後依次教小學課本。這對於當時苦於無師請教的我而言，確實是天的好消息。我從第一天開始，就抱著十二萬分的期待，把齊先生所說的話，一言半句也不漏掉，集中全部精神收聽。這是我頭一次跟注音符號正式接觸。從那天起，我出外的時候，一定把課本放在口袋裏，一有空閒，就把它拿出來溫習，如果有不懂的地方，或者難以發音的文字，等到下午六時半還有一次重播，再小心聽講。

齊先生所用的教材，是小學課本，而小學課本是由淺入深。如果對於每一個字都念得非常正確的話，進步是很快的。關於這一點，齊先生的教法，確是登峯造極，無懈可擊。像這樣子一個字一個字確確實實記起來，好比蓋房子的時候，把磚頭一塊一塊疊上去一樣，日子一久，就積少成多，可以應用自如了。

還有一點，齊先生聽說是北平的旗人，可是他的北平音比較容易學習。因為同為北平人，有的人無論講話或讀書的時候，捲舌音（兒化音）用得太多，使本省人認為國語的發音好難學呀！終於聽而生畏，只好敬而遠之。而齊先生的講話，捲舌音、兒化音用得並不多，令人有一種輕鬆的感覺，認為國語的發音並不是那麼困難，可安心學習。

我就在這種情形之下，從廣播學習齊先生的國語，而覺得進步相當快，雖然這只是限於一個字一個字的讀法而已。至於聽話和說話，必須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慢慢訓練以後，才有效果，所以只有耐心等待。

筆談——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

我於民國二十六年三月畢業臺北帝國大學以後，到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底為止，一直在報館服務，或主編副刊，或主編省市新聞，前後達八年之久。可是我爲了要繼續發展我的學術興趣，幾乎每週或每兩週一次，返回臺大去，利用其圖書，做些研究工作。當時因爲臺大只有杜聰明先生一人任教授，其餘臺灣人一律不聘用，所以我不得不採取這種自由式的方法，跟臺大保持聯繫。因此光復不久，我就應聘跟林茂生、陳紹馨兩位先生，每天到臺大去協助教育部特派員羅宗洛、陸志鴻、馬廷英諸先生，接收臺大文學院、圖書館，以及預料。十一月十五日，日方正式將臺北帝國大學移交我方，遂成立「國立臺灣大學」。旋於十二月一日，羅宗洛先生正式就任第一任校長，而我們三人亦均應聘爲文學院教授，而當時教務處尚未成立，所以校方聘我兼教務主任，辦理招生。不久上課開始，除了三民主義、國文、中國史地等科由本國人擔任以外，其餘科目由留用的日籍教師擔任。而這些日籍教師，一接到遣送命令，於五天之內一定要離開臺灣返回日本，所以經常發生有功課沒有人講授的現象。

而我除了辦理教務之外，因爲教師不夠，所以每週擔任國文十六小時。不過當時我不會講國語，學生也全部都是本省籍，他們只能講日語，既不會聽國語，更不會說國語，所以只好用臺灣話教，而學生們一向是用日語讀中國文章，現在

改用臺灣話，覺得另有一番滋味，個個都非常用功，進步也特別快。當時所讀的，是「孟子」和沈復的「浮生六記」。事隔四十多年，今日碰到當時的同學的時候，他們還會很快樂的提起「浮生六記」的女主角芸娘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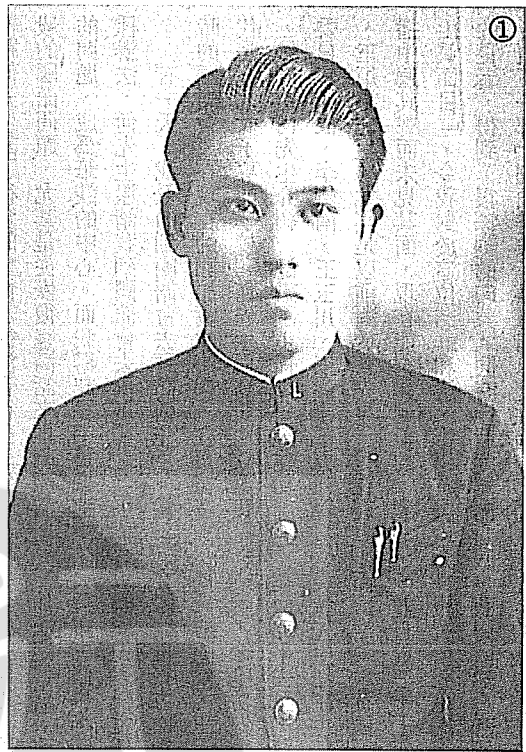
像這樣，我天天忙得不可開交，到了下午五點下班了，但是我並不回家，在外面隨便吃過晚飯之後，就趕到新生報編輯部，去收聽六點半齊鐵恨先生的國語教學。當時的新生報社，尚未改建，編輯部是在現在建新百貨公司樓上。而編輯部同仁，都要到十點前後才上班，所以偌大的編輯部只有我一個人。我將注音符號表攤開在桌子上，等到聽完齊先生的教學之後，就大聲念了又念。有一天，大約念了三遍之後，看見一位帶著黑框眼鏡，大約四十多歲的陌生人和一位青年人進入編輯部來。帶眼鏡的看見編輯部只有我一個人，就走到我的身邊來，很有禮貌地用國語向我打招呼。我因爲聽不懂他的講話，自己又講不出國語，只好連忙站起來，握住他的手。他立刻知道我不會講國語，馬上就拔起插在胸前的鋼筆來，在紙上寫一行字，自我介紹。

「我是從國語推行委員會來的，名字叫何容。這一位姓陳，名叫士駿。請多多指教。」

他把那位青年人介紹給我。我知道他們是從國語推行委員會來的，跟齊先生是同事，所以肅然起敬。然後我也用筆談問他：

「何先生！您有甚麼事情，要我幫忙？」

「不，我是來校對國語副刊的，以後每禮拜二一定會來的。」



① 作者讀台北帝大時照相。

② 一九八二年作者在台大講演時的神情。

③ 一九七〇年六月作者（左）與川端康成合影。

「那好極了！我現在正在學習國語，今後還請何先生多多指教。」

何先生知道我正在學習國語，他特別高興地說：

「剛才我進來的時候，就聽到了你在高聲念注意符號。大體講起來，念得很不錯，只是ㄨ、ㄨ、尸、ㄨ跟ㄗ、ㄘ、ㄨ的區別，念得不大正確。」

「謝謝！那麼請何先生念一念給我聽吧！」何先生立刻答應我的請求，再三再四念，而且不厭其煩地矯正我的發音。

我們雖然彼此未曾相識，但是一見如舊，筆談也談得非常投機，大有「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之概。

由於這一晚的筆談作為機緣，以後每禮拜二都跟何先生談了很多的事情，從注音符號談到一般的國語問題，尤其是從恢復臺灣話來推行國語的問題，成為筆談的中心。而我舉起雙手贊成這種辦法，何先生還請我到國語會去玩。

有一天，我真的到國語會去拜訪何先生。當時的國語會設在現在的國語實驗小學，在日據時代是臺北女子專門學校。何先生很高興地歡迎我，然後由何先生介紹，認識了主任委員魏建功，委員齊鐵儀、李劍南、王玉川、王壽康、方師鐸、王炬諸先生。尤其是以前對於齊先生，只在廣播中聽其聲而未見其面，現在能夠見到他的「廬山真面目」，令我對於這位慈祥和藹、彬彬有禮的長者，得到了很深刻的印象。同時，我從國語會買了一部「國語辭典」共八冊，現在尚在書房

的座右。據說當時國語會只帶幾部來，而我能夠分得一部，算是非常幸運了，而現在已成爲稀覯本了。商務印書館的四本裝是後來印的。

當時，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爲了培養國語推行人員，把全國畫分爲若干地區，設立國語專修科；臺灣省跟福建省畫爲閩臺區，委託臺灣大學代爲辦理。那時候的臺大校長是陸志鴻先生，他同意辦理，就在三十六年二月開始上課，科主任是魏建功先生，而我因爲是臺大教務主任的關係，也兼專修科教務主任。學生大部分都是福建籍的，本省籍很少。豈知到了六月，陸志鴻先生辭職，由莊長恭出任第三任校長。莊校長做事較爲消極，他到任不久，有一天請我到校長室去報告國語專修科的事情。其時，我極力主張在臺灣推行國語的需要，認爲可以利用臺大的設備和經費，加強辦理。哪知莊校長的意見恰巧跟我相反，他決定停辦，改由省立師範學院接辦。所以臺大只辦專修科半年而已。師範學院接辦之後，由王壽康先生任主任，共辦了兩屆就停辦了。現在在國語推行方面很有貢獻的人士，如林良、鍾露昇、方祖燊、王天昌、林國樑等，都是該科的畢業生。魏建功先生在臺灣大約住了一年半之後，就回北平去了，後來由何容先生任主任委員，洪炎秋先生任副主任委員，不久我也被聘爲委員，而國語會也從國語實驗小學遷到今之中央圖書館，並且於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光復節創刊國語日報，由我主編「鄉土」周刊。由於以上的關係，我跟國語會和國語日報越來越接近，而請教何先生的機會也越來越多了。

推行國語的尖兵——國語副刊

前面業已提過的新生報的「國語」副刊，名義上是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編，其實際工作是由何容先生負責的。這個國語副刊可以說是國語推行運動的尖兵。

國語副刊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發行第二期，以後每逢星期二發行一次。第一期有下列的「發刊詞」：新生報爲了達到建設新臺灣的使命，逐漸把報紙的形式和内容改進。最近做到增加副刊的工作，適應本省的需要，本刊就成了一個「當然」的副刊。

我們省內外人士，一到勝利收復失地的時候，誰都很快的覺得這裏迫切需要「國語」。究竟所謂「迫切」的需要是甚麼？迫切「需要」的國語是甚麼？和「怎麼」來完成這迫切的需要？這些問題，本刊希望做個公開討論的機關刊物。

原來在抗戰之前，北平有一個「國語週刊」，初期是京報的副刊，由故錢玄同教授主編；後期是世界日報副刊，由故白滌洲先生和何容先生編輯。它的性質是當時從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直到國語推行委員會發表研究、審查、討論、宣傳等文件的刊物。本刊現在也可算是從本省國語推行委員會跟社會上取得聯繫，互相研究、討論的機關刊物。

國語運動在我國還算是一種社會運動，始終沒有得到政府的徹頭徹尾的、用政治力量嚴厲執行過。如果把這一點基本事實忽略了，我們就會文

不對題。本刊在發刊的開始，特別交代明白，這是要請省內外人士注意的。因此，我們的討論態度是客觀的，並無成見。國語運動的歷史，卻也有了五十年。它的成效多得之於自然發展，國語界同仁多半以業餘的光陰，義務的努力，維持推進，所以今天本省需要這方面工作的人，還能得到一些「開元天寶」的「宮人」似的老同志來效力。他們二三十年間所做的工作，對於「標準」，對於「教學」，對於「個別問題」，都還有一些認識。本刊把他們的意見介紹給社會，也許比較著重事實的。因此，我們得聲明不發空理想的議論，而提供解決問題的理論。

這樣，本刊就在今天與臺灣社會相見了！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同時，新生報也有下列「本刊啟事」：

本刊由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編，歡迎投稿。經採登後從優致酬。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篇幅有限，來稿最好不要太長，並且寄交新生報編輯部，外面註明國語副刊字樣，不要寄給私人。提出國語問題請解答的，不送稿酬。

第一期共刊登了「國語運動綱領」（魏建功），「臺灣人語言意識側面觀」（吳守禮），「茶房與句辦」（國語解詞，士毅），以及「國語問題解答」一則（編者）等四篇。

這個「國語副刊」一直刊行到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一共出了三十二期就中斷了。在這三十二期當中，何容先生的文章有三篇，即「關於國語的標準」（第四期），「從臺灣話學習國語」序言（第五期），「推行國語和恢復方言

」（第六期）。後來到了三十七年九月一日，曾中斷了十八個月的「國語副刊」又復刊了。其「復刊詞」如下：

推行國語，需要定期刊物。定期刊物的內容，需要各方面都顧到。從說話到讀書跟寫作，都是「國語」範圍內的東西，都是國語刊物的內容。因此，這個刊物也就很難使每一個讀者都滿意；因為讀者的需要不同，每一個讀者都希望這個刊物專登載他所需要的東西。可是一個刊物，尤其是日報的副刊，是不能這麼辦的；因為日報的讀者是各種教育程度不同職業不同的人，他們對於「國語」的要求也不同，有人要求多知道一點理論，有人要求多供給一些教材，當然還有人要求其他方面的東西。

這個刊物雖然不能使每一個讀者都滿意，卻也希望對所有的讀者都有用。這就是說在內容方面希望能儘量顧到不同的需要，而不太偏於某一部分讀者的需要。不過，所謂讀者是指這個副刊的讀者，不是指日報的全部讀者；因為日報的讀者，至少有一部分人對「國語」無所需要，他們既不學國語，也不教國語，更不研究國語，只是有時候在看完新聞之後也順便看一看這個副刊而已。

根據過去的經驗，這個副刊的內容假如能做到對於學國語，教國語，或研究國語的人都有點兒用，就不會受到讀者的「不

好」的批評；因為讀者們知道，有些材料雖然他自己不需要，可是還有別的讀者需要。倒是那些順便看一看的讀者，難免感到這個刊物不合社會需要；這是因為他們往往假定一種社會需要，因此覺得刊物的內容與這個需要不合。遠在兩年前，我們在新生報編過一個國語副刊，有些朋友們便常對我們說：「你們這個國語週刊太專門了！」可是我們又看到有些小學教師把那些「專門」的文章剪下來存著，這可以證明那些「專門」的文章，並非不合讀者的需要。那麼，何以有人覺得這些文章太專門呢？那是因為他們所假定的社會需要的範圍太窄了。他們以為社會上所需要的「國語」就是「國語會話大全」和「注音符號講義」，除此之外，都是不合社會需要的專門東西。像這種批評，我們很歡迎；這意見，我們卻不敢遵從；因為我們所知道的社會需要並不是這樣。

現在這個國語副刊又要發刊了（其實也可以說是復刊或續刊），我們趁此機會向讀者作一個簡單的聲明。我們希望儘量使這個刊物合乎讀者的需要，我們歡迎國語運動的朋友們給我們批評跟指教，也希望大家明瞭這個刊物刊行的意義。

這個復刊的「國語副刊」，一直發行到三十八年十一月四日第五十期，就停刊了。在這五十年當中，何容先生發表了二十多篇文字。

在國語副刊所發表的文章之中，大部分都是

偏重理論方面的為多，這是為了要適應光復不久的臺灣社會的需要而來的。其對於國語推行運動，確實有很大的貢獻。因為有這種理論做後盾支持，國語運動才能夠加速的展開。

風趣而好玩的文字遊戲

胡適先生於民國八年以二十八歲的年輕人就任北京大學教授之時，發表「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曾經轟動整個學術界。而這一本名著，不久也在日本發售。當時正在東京商科大學就讀的二哥及時，暑假返臺的時候，買了一本帶回給父親看。父親本來是個舊式的讀書人，但是民前一年梁啟超來臺之時，曾經跟梁先生面談，然後就一直愛讀「飲冰室全集」。所以對於新學極感興趣。現在讀了胡適先生的這本「哲學史大綱」，增加父親對於古代哲學的了解。父親把這本書讀了好幾遍，並且用硃筆逐句圈點。日後父親反對孟子罵墨子是「無父無君」是「禽獸」的說法，而極力提倡「孔墨並尊」，就是受梁啟超和胡適兩位先生的影響。

民國二十二年，胡適先生又出了「四十自述」。父親讀了之後，知道胡適先生在孩提時代曾經隨其父親鐵花先生（名渭，當時任臺東直隸州知州）在臺東住了一年兩個月，並且認識了七百個字，益發對胡適先生發生敬慕之熱忱。以後凡是胡適先生的著作，莫不設法搜集。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父親遂在新生報上寫了一篇題目叫做「胡適在臺灣識字」的文章，介紹胡先生與臺灣的關係，在文末並且盼望胡先生早日來臺

，到臺東尋訪他幼時開始識字的發源地。

這篇文章發表後不久，北平就吃緊了，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先生搭教育部特派的專機離開北平到南京，翌（三十八）年春到臺灣來，住在本市福州街臺大校長傅斯年先生的官舍。當時父親對於這位渴慕很久的胡適先生的來臺，為表示了歡迎之意，於三月二十六日在中山北路三段的晴園自宅，設宴招待，並請傅斯年、沈剛伯、梁寒操、李翼中、謝東閔、辜靜農、浦薛鳳、游彌堅、李玄伯、吳克剛、林熊祥、杜聰明、洪炎秋、陳逸松、陳逢源、林忠各位先生作陪，由我們四弟兄逢時、及時，當時和我奉侍。宴席分兩桌，我因為替父親翻譯，跟胡適先生同一桌。大家一面吃一面談，所談的無非是關於文學革命的問題。正在這個時候，有位客人向胡先生敬酒之後，問胡適先生說：「胡先生，您的人不主義之中，有一條是不講對仗，但是對仗是不是可以說是中國文字特有的現象？」胡先生點點頭說：「是的，因為中國文字是一形，一音，一義，所以很容易形成對仗，但是對仗必須對得很自然，才有意思，如論語也用了不少對仗，然而句句都非常自然。如果為了對仗而找對句，並且過分加以雕琢，就變成文字遊戲，失去了文學的意義了。所以我們不談文學，單談遊戲的話，這種文字遊戲也夠好玩的。例如人名對人名，地名對地名，雖然不容易對得好，但是如果對得很巧妙的時候，會令人拍案叫絕的。」

胡先生想了一會兒之後，提出一個題目，要大家對對看。「今天的主人是黃純青先生，各位

想想看，有沒有適當的人名，可以對對呢？」

大家想了半天，也想不出適當的人名來，最終還是由胡先生親自拿出答案來：

「大家都知道省政府官員裏面有一位朱虛白先生，這「朱虛白」三個字是不是可以對「黃純青」呢？」

「妙極了！黃對朱，純對虛，青對白，對得太好了。」

有一位客人一面這樣講，一面向胡先生敬酒說：「胡先生，您的大名叫胡適，您認為誰的名字可以跟您相對呢？」

這時，胡先生先問洪炎秋先生說：「洪先生，你是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何容的大名，是不是可以對胡適呢？」

洪先生也點點頭說：「何對胡，容對適，何容對胡適，對得真好啊。」

這一天的酒宴，就在這種融洽、輕鬆、幽默、風趣的氣氛中結束。然後我請大家到隔壁小房間，參觀陳列在那裏的胡先生著作五十多本。胡先生一看，非常高興說：

「你們父子把我的著作收藏這麼多，實在很難得。其中好幾本，連我自己都沒有，而且一直到今天還沒找到。你們父子真了不起！」

後來遠東圖書公司印行「胡適文存」的時候，胡先生把當天的事情寫在序文裏頭。本來，胡先生是文學革命的主唱者，而且徹底反對舊文學，但是對於舊文學中的文字遊戲，卻極感興趣。

謝謝趙廣鵬教授及黃得時教授夫人提供珍貴圖照。